

学习·文化视点

学习·践行

# 以人为本，推动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

##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本报记者 张丽



▲ 刘尚希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深入挖掘与利用丰富而珍贵的文化资源，以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怎样进一步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 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

**学术家园：**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进一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刘尚希：**中国式现代化应从三个维度理解：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即更大程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进入新阶段，人的现代化是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人才是目的本身，其他都是手段和路径。

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的过程。人的主体性是基于人与物的关系而言的，是人支配物，而不是被物所支配，要防止人的依附关系和异化；人的创造性是基于人与动物关系而言的，指人不仅能从事体力劳动、简单劳动，还能通过创新驱动发展；人的文明性是基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的，越是更多考虑他人、较少考虑自己，就意味着社会的文明性就越高，反之越低，人的文明性不仅仅体现在自利，还要利他。只有当人的“三性”不断彰显，人才会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人的发展既是手段，更是最终目的。把人本理念贯穿所有政策和各项改革中去，才能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

**学术家园：**您曾经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中华民本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为什么？

**刘尚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中华文化形成

平越高，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越快，人本逻辑的实现程度就会更高。

### 以文化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学术家园：**在文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

**刘尚希：**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的“催化剂”。不同地区产生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最终反映在不同地区的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文化既是一种内在价值，也是一种隐性的社会规则，对经济具有广泛的渗透性。一种文化所具有的观念意识，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也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异，就在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非仅仅是发展阶段带来的。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勤劳。勤劳，作为一种美德，激励人们勤奋工作。这种“文化激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激励作用。

文化，一方面通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因其渗透性为经济、社会等带来新能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都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信”，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稀缺资源，社会文明程度高，人们都讲诚信，都遵守契约精神，经济的运行成本就能够大大降低。一般而言，商业文化发达的地方，市场经济就比较发达，经济发展得也比较快。推动经济繁荣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前提；商业文化是营商环境的核心，有了发育良好的商业文化，竞争与合作所依赖的市场秩序就会自然形成，经济就会健康而持续，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就会得到更好保护。文化不能买卖，文化转化为产品则会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如文学艺术、绘画、书法、电影、文物资源等，还可以通过赋能经济带来价值，如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其附加值就会更高，如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文创产品、各种服饰等。

此外，文化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还为人的精神发展提供坐标和方向。文化不仅为经济发展构建了一种可持续的隐性秩序，也为人的精神发展构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内生秩序。那么，怎样发挥文化的这种工具价值？新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在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中，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文化发展得好，经济就发展得更好，又反过来促进文化发展，提升文化传播力、加强文化渗透力，不仅在国内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全球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要把经济发展从物的层面上跳出来，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还要创新创造文化，提升道德情操，让人们有更强的方向感、充实感，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美好生活自会降临。

**学术家园：**您多次谈到数字化、低碳绿色等科技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文化赋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刘尚希：**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需要文化的赋能与加持。比如绿色经济所提倡的低碳绿色理念，其实就是要改变传统工业化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使之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相契合。从这一角度而言，因为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基础，低碳绿色在我国实行起来，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产生共识，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不是在物理的世界，而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虚拟世界超越时空限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降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大大拓展，过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数字化的加持下成为可能。比如过去小微企业基本无法从事世界贸易，现在通过跨境电商就可以轻松参与全球的分工与合作，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数字化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影响人行为的隐性规则，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虚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无须见面，相对于过去的“熟人世界”，这一“陌生人世界”更需要文化的加持——建立可信的规则。比如说网上购物，人们文明程度高、文化素质强，都能保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在宽松而放心的网络购物环境中就会获取更多的便利。反之，在文化“缺口”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就可能成为“坏人”的有力工具，人们在得到便利性的同时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当风险成本超过收益时，数字化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被弃用。虚拟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法治降低了数字化的风险，若有了文化的加持，这种风险就会更低。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的加持，数字革命才能演化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 编辑如何深化自我阅读

##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重要命题

郝振省

这些年我与全民阅读活动结下了深厚情谊。我曾参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文本的起草工作，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长达10年多，也写过关于“全民阅读的理论思考”的相关文章。担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以来，又比较认真地探讨过全民阅读与编辑阅读的内在逻辑关系及相互支撑、相互给力的激励机制，也是国内“书香三八”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者与追随者。在此，我想在世界读书日前夕，谈谈深化编辑自我阅读的一些想法和思考。

其一，要努力地把阅读硬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书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明确提出了建立书香社会的战略任务。所谓生活方式，是说一个人的阅读应该达到说一种境界：就像每天不进食不饮水就无法保持正常的生存状态一样，如果每天不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里阅读相应的出版物，就像丢了魂儿、乱了章法，表现出一种焦躁的、无序的甚至惶惶不可终日状态。在当下阅读活动由零散必要性、一般必要性转变为充分必要性，出版物由普遍国民的非必要性、少数国民的奢侈必要性转变为普遍国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时代，编辑应该义无反顾地做这两种方式的示范者和应用者。最初是硬着头皮把书读进去、再读出来，一旦成为习惯、成为生活方式，读者就会处在一种“人的现代化”状态，其工作（生产）往往就能更多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其二，要把读经典与非经典结合起来。一般说来，编辑必须有计划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通过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确立编辑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保障出版方向、思想导向和价值取向，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宗旨和守好意识形态阵地的使命意识。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根据本职工作有步骤地选读经典著作。如从事古典出版和传统文化出版的编辑还应该钻研“三玄四书五经”，从事航天航空方面的编辑出版人可以选读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经典著作，等等。

除此，为什么还要有一定量的非经典阅读内容？这不只是因为编辑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多数是非经典方面的文稿，而且阅读经典需要非经典的作品调剂，非经典出版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经典阅读和精品出版提供重要的养分和启迪。在非经典阅读中，不只是强调要读书，还要把读书与读报、读刊、读网结合起来。这不仅因为报刊网都属于出版物、属于读物，而且因为报刊网往往能为策划新的出版物提供若干重要线索，触发一些创新灵感，引入一些著名经典等。

其三，要把一般性、浏览性阅读与思考性、分析性阅读结合起来，把后者作为重中之重。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少报刊网的文稿大而不当、用词不雅，浏览一下即可。也有的书刊网的文稿确有一定内容，但是与读者自身的专业岗位、职业领域不大吻合，这就有必要去花很大气力过度认真地阅读。而对于真正有思想力量的书、有内蕴逻辑的书还是应该坚持思考性阅读、分析性阅读、反思性阅读，如此才能够读出其中思想的真谛。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讲到，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可以把整个宇宙浓缩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而整个



### 学者说话

# 古书训释要区分“讲得通”和“讲得对”

孙玉文

常常有人问我：训释常见古书中某些疑难字句，经常出现五花八门的结论，有的结论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但有些结论似乎都讲得通，令人莫衷一是。您对此后这种情况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训释古书，要区分讲得通和讲得对。讲得通不一定讲得对，讲得对一定能将上下文讲通；训释古书，不能满足于讲得通，必须做到讲得对。

无论是传世的还是地下出土的古书，它们一般用汉语、汉字记录。汉语语句表达的语义一般只有一个客观的意思，偶尔人们可以打破这一规矩，形成汉语的谐音双关，使语句具有双重含义。例如汉朝佚名《客从远

方来》：“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思”是正意所在，但它在字面上是谐音“丝”，“著以长相思”意即将长长的丝绵贮在被子里。谐音双关尽管具有双重含义，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理解语句的人硬性添加进去的。王力先生《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说：“古人实际上说出的话不可能有两可的意义。真理只有一个：甲说是则乙说必非，乙说是则甲说必非……我们如果要求知道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那就必须从两种不同的解释当中作出选择，或者是从训诂学观点另作解释，决不能模棱两可。”

汉语语句表达的语义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写文章的人希望读者能客观地加以理解的，那么古书的训释目的就是要把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客观地提取出来，不能走样，这是由语言的本质属性及其实际功能决定的。

我们今天训释古书是后人对古书的理解，因此有时对古书中一些疑难字句的训释不免见仁见智。人们组织文章时，表达的方式不可能只有一种，而可以有多种方式。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说：“吴中士人家藏其

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字字，始定为‘绿’。”因为上下文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都能讲得通，而训诂学上又有双声叠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一类的具体训释方法，这就给追新逐奇者随意训释带来方便，造成不少似乎讲得通的训释结果。《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批评说：“研究《诗经》的学者们往往着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叠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诗经》以外，对别的古书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当然，理论上，有可能这“十种不同的结果”都可能讲得通，也都可能讲得不对。因此，为了确定古书的正解，我们必须区分讲得通和讲得对。

古书训释者要想有讲得对的训释效果，就必须打好必要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必须

精密化，用以指导我们的训诂实践。为了得到讲得对的训释成效，这里主要提出两点：

一要紧紧抓住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这个本质，加强语音史知识和字的形音义匹配知识的积累，严格运用这些知识开展训诂工作。我们训释要区分通假字和同源词，不要轻易地利用通假作为随心所欲的训释的挡箭牌，谈通假要有铁证。除此，还要重视前人的注音，古人注音往往反映了他们的释义，不能撇在一边。例如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进进胡音务胡乐。”《全唐诗》“乐”下原注：“音洛。”这个注音应来自元稹的自注。有人不管这个注音，将“乐”理解为音乐，将此例的“胡乐”理解为古代称西北方及北方民族和西域各地的音乐，似乎也“文从字顺”，但此训释不合元稹原意。原诗“乐”既然注“音洛”，那么这里的“乐”不可是“音乐”义，“胡乐”是指像胡人那样表达喜乐之情。

二要综合利用多种方法，将疑难字句的训释完善到一种可信的程度。人们训释古书，对于疑难字句，往往采用“以义求义”的训释方式，排比出现那个需要解释的字句的相关例子，得出一个语义，这在逻辑上属不完全归纳推理。我们知道，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为了完善通过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反复论证，将这个或然性的结论完善成必然性的结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